

歷史、時代與人物

李又寧

——有關胡適研究的若干斷想

歷史研究是一種紀念，紀著念著故人往事，尤其是時間大流淘不去的千古人物。歷史研究是心平氣和地重新發掘史料、重新發現問題、重新思考過去、重新觀察現在；並且嘗試以新觀念、新角度、新方法來敘述、解釋人與人、人與團體、人與社會、人與地域、人與時代的種種活動和關係。歷史就是生命，個人的與集體的；生命就是歷史，平常與非常的。歷史研究中，有過去的個人的與集體的生命，也有史學工作者的生命、思想和感情。

胡適先生的生平和著作，昭昭在目；諸家的專著和評議，也行於世間，既不用介紹，更不須我來確定其價值和地位。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。學術研究也是如此，後來者受益於先行者。乘涼者無須口口聲聲道謝，種樹者也未必期望如此。在胡適研究的行列裏，我連後來者都還算不上，對先行者的種種成就和貢獻，仰敬但還不能景從。因為這篇文章將強調的，是歷史人物研究的多樣化和個人化，不擬引用諸家之作，而願儘量用我自己的語言，來談談自己的對於胡適研究的一點看法。

一、為什麼要研究胡適？

胡適的重要性，是多方面的，學者專家們已說過的，不需再說。我覺得，他對治史者最大的吸引力，在於他代表二十世紀中國的主流，這主流還在前進不已，引向未來。

二十世紀的世界，是多元化的；中國也如此。多元的潮流中，有前進的主流，也有倒退的逆流。主流的前進，並非一洩千里，四通八達；而是會遭到種種逆流的阻擋，甚至於不得不暫時的、表面的潛藏。那些是主流？那些是逆流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各人的看法也可能有階段性。現在已是二十世紀的末葉，回顧過去，大家看的比較清楚。

二十世紀是中國重新定向的時代，方向是多種的。主流的方向，是走向世界，也就是現代化。關於中國的現代化，有種種的學說和研究，但也可以很簡單直接地說：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從先進的國家，引進一些思想方式，一些生活方式，為的是擴大精神的空間，改善物質的環境，開拓活動的領域，增加選擇的條件，豐富人生的內涵，肯定個人的價值和尊嚴。

人是宇宙中的主體，人是社會和國家的根本。因此，中國人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部分，也可以說是現代化的基礎。人，是現代化的設計者、推動者、和實踐者；現代化又不斷的在改變人，從有形易見的外貌、談吐、舉止、生活、習慣、風尚，到無形難量的意識、觀念、知識、思想、感情、情緒。有形的和無形的變化，也不息地互相影響。一般人及治史者多偏重集體的、可見的現代化，如科技、工業、經濟等，而忽視、或輕視個人的現代化。然而，環觀當今的世界，

在集權制度下的國家，那一國的經濟比得上有個人保障的國家？！再看歷史，歐西的現代化始自文藝復興，始自獨立個人觀念的建立。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，提示了個人在現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沒有獨立的個人，就沒有獨立的創新；沒有獨立的創新，現代化只能浮在表面，如集體的工業化；就是表面的現代化，也有旦夕之憂。胡適先生看不到當今的世界，但他善於讀史，而且能把歷史的知識和親身的體驗結合起來，融會貫通，因而洞察二十世紀的大勢，不但把他自己投入了主流，而且高舉一面大旗，上面寫者：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。為這個觀念和它的實踐，他多方面的努力，數十年；為中國的現代化及中國個人的現代化，播種並耕耘。他的收穫，已歷歷可見；未見的，還在成長之中。

中國的哲學思想，簡言之，是人本主義，肯定人在宇宙及社會中的地位和尊嚴。但是，在網常倫理的社會秩序中，人的地位和價值，必須在集體生活中體現；因此，人是種種互相牽連、互相制約的聚集體 (aggregate)，而不是能夠獨立生活、獨立思想、獨立創造的個人 (individual)。不論男女老少、貴賤尊卑，都從屬於一個或多個的集體，如家、族、鄉等等。就是天子，也逃不出從屬關係的制約，也沒有獨立的存在。他的價值和尊嚴，在於他能遵從並且執行種種先例、成規、和制度；天子之下的，更是如此。在這傳統下，人生的意義不是有自我的，有個性的創新，而是為一個或多個集體服務，不但為活人服務，還為死人服務。這種從屬的服務觀，在現代中國，變本加厲，更為制度化、更為教條化、更為瑣細化，所加之於個人與個性的枷鎖也就較前更緊更重，形成阻礙人的現代化的巨大逆流。有獨立的個人，才有獨立的原創性 (originality)；有原創性，才有革新，才有比較，才有選擇，才有進步。但是，逆流淹沒了個人，淹沒了個人的原創性，

淹沒了多少進步的可能性。

獨立的個人，個人的價值和尊嚴，是近代西方思潮的主流，與它相關的是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人權等觀念。二十世紀的世界史，如果用掃描法來一般化，可以說是這些觀念在各地不斷地發生作用，也不斷地遇到種種阻力，有時成此起彼伏的波浪，有時澎湃如潮湧。在二十世紀中國，在這主流中游泳者不計其數，胡適先生是其中最顯著的代表。有些游泳者半途而止，有些轉入其他的潮流；胡適卻持久地、努力地在主流中求進，直到生命的盡頭。在求進的過程中，他與許多逆流碰撞，如專制、獨裁、集權、舊習、成見、愚昧，他有時大聲的呼喊，有時理智的抗議，有時默默的容忍。無論姿態是怎樣的，他所扮演的多種角色，幾無一不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重要的時代意義，也可以說，無一不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題目。如果把他的歷史當作廿世紀中國的一個縮影 (a microcosm of 20th century China)，也許不算過分。廿世紀中國的縮影，固然很多，但如果不研究他這一個縮影，恐怕很難全面瞭解、很難平衡敘述、很難令人信服的解釋廿世紀及以後的中國歷史。這個縮影的內涵，歷史的、文化的、個人的，都很豐富，耐人研究。不但值得精研細究，而且應當嘗試運用新角度、新方法去研究他，他這個人，具有個性和生命內涵的個人。他提倡學術的研究要有新意，以他的研究作為一種嘗試，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？！

二、為什麼要比較研究歷史人物的多樣關係？

人物研究，通常以一人為主；古今中外行了兩千餘年，也將繼續著；它的功用和價值是多種

的，為學者所熟知。在中國，傳記和年譜久為記載人物的主要體例；還有列傳，記述兩人以上的事跡。無論傳記、年譜、或列傳，都有很多限制和不足，雖然各有很多優點和用處。因為以一人或很少數人為主，作者的目光自然而然的集中在傳主或譜主的身上，而難能平視、環視、詳視傳主或譜主周圍的人與事。突出傳主或譜主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事實上，每一個人和周圍的小環境，如家人和朋友，朝夕相處，或經常往來，時有交互作用 (interaction)，是傳主或譜主的生活的一部分，給他(她)切身的感受，可能影響他(她)的思想發展、職業的或學術的生涯、政治活動等。可是史者往往不記載這些，認為是個人的瑣事，值不得進入史傳，史者不注重的史料，易於失傳，或者走樣。我認為，這是一個缺憾，因此這本及以後續出的論文集，採取的是另外的方式，即平視、環視、詳視胡適與周圍的個人的交往。二十世紀是容許有個人的時代，史學研究也應如此，給予個人以適當的地位。這也可以說是史學的一種現代化，尊重個人，而不突出顯者著者，更不作所謂的英雄崇拜，而以顯者著者與常人一般，有人的共性，也有個人的特性。

專研一人，很難避免偏見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神交，久而久之，前者往往會受後者的影響，因而有意識的、潛意識的、或無意識的從被研究的角度來論人議事，雖然意識的程度因人而異，不可一概而論。從同情到欣賞到讚揚，是人之常情；史者也是常人，難能例外。不久前，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，我聽到一位很博學、很傑出的史者說：「我研究張之洞的時候，覺得張之洞很偉大。後來我研究李鴻章，又覺得李鴻章很偉大。」(大意如此。)這話真誠、坦白。其他(她)從事歷史人物研究的學者專家，可能也有類同的經驗，只是沒有這麼直接的說出來，因為史學工作者久習於把自我隱藏在公正無私的高帽下面。我又想起幾位歷史人物的專家，遇有批評這些歷

史人物的場合，專家會挺身而出，為之辯護，甚至爭得面紅耳赤。這完全是正常的，不足為奇，也不足為病。研究一個人，如果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、如果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、如果不用自己的腦袋去思想，寫出來的是資料的堆積，冷冷冰冰，僵僵硬硬，其中既感覺不到歷史人物生命的氣息或靈魂的跳動，也看不到歷史研究者的生命功能和價值。如果史學只是資料的累積，將來的電腦會做的比人更周全。那麼，史學工作者的價值和尊嚴，又在那裡呢？這是電腦時代史學工作者面臨的一個危機。

歷史研究的目的地，在於追求真實，在於認識並重現歷史的真實面目。史料的累積，是追求真實的必要過程。已著為文字的史料，現在和將來可以輸入電腦。但是，史料是無窮無盡的，處處有史料，散布在世界各地。一切都在日趨世界化，史學也一樣。怎樣在無垠的時空中，去探尋、發現、捕捉種種的史料，仍然需要人去運用人腦、人的手與腳的功能。怎樣解釋、融會史料，使之成為具有生命的內涵的故事，是電腦做不了的，只有人，具有史識和史見的人才能做到。具有生命的人，才能賦予歷史以生命。史識和史見，是史學工作者所表現的一種生命力，不僅是理性和知性的瞭解和識見，而應同時帶有感性和悟性的體會和同情。也就是說，客觀中有主觀，主觀中有客觀。如果完全沒有主觀，必是東徵西引，人云亦云；如果不立足於史實而放言空論，那也不是史學。怎樣結合主觀和客觀，互相配合而不失所偏，才能在史著中有所創新，才能表現出史學工作者的功能，才能表現出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和個性。

中國的史學，強調客觀、強調類性、強調歷史的規律性，因此史著中往往看不見活活潑潑的個人，只看見一堆堆的名字。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，不大會說常人說的人話，到挺會說一串串的

名詞，（多是抽象的），教人似懂非懂。歷史的真實果真是如此嗎？還是史學工作者使它如此？史學工作者又為什麼要使它如此？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？在那種情況下，史學工作者的個性、傾向性與描寫的歷史真實性是一致的？在那種情況下，史學工作者的個性、傾向性與其描寫的歷史真實性是悖離的？這一連串的問題，常在我的腦際縈迴。

這些問題，我自己不能解答，恐怕也沒有一定的解答。如果史學的問題，都有一定的解答，那史學工作者還有什麼可做呢？

而且，主觀和客觀，有時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。某甲認為的客觀，某乙可能認為是主觀；某甲認為的主觀，某乙可能認為是客觀。譬如說，某甲傾向革命，根據一些史實強調洪秀全是革命的；某乙不傾向革命，根據相同或相異的史實強調洪秀全是守舊的。究竟誰客觀？誰主觀？還是兩人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和主觀？

史學工作者應當客觀；但是史學工作者是人，生活在某種的時空之中，例如：歷史環境、自然環境、文化環境、社會環境、和政治環境，不可能不受種種環境的影響。又處於和各種人、各種團體、各種階層的關係之中，不可能不受種種關係的影響。和種種環境與人的關係，也就不能不反映在史著之中，不論是有意識的、潛意識的、或無意識的，也不論各人的意識的程度。上述是一般的情形。中國的史學，另有一個特殊而且嚴重的問題。幾千年來，政治籠罩著史學，近代現代尤甚。政治風雲，變幻無常。風險中，史學工作者戰戰兢兢，為了保命，不得不亦步亦趨於流行的政治運動，從事牽強、附會、扭曲、誣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個性和創見是天方夜譚。

歷史人物何嘗不然？不也處於種種環境和關係之中！？親其所近，疏其所遠，是人性之常。

史學工作者對於歷史人物的理解、感覺、和描寫，也就有種種的可能性。人，本是各有異處，各有個性，為什麼一定要勉強求同？讓各人的個性和特點表現出來，不也就是表現歷史的真實面目嗎？更何況二十世紀是一個容許有個人、有個性的時代！為什麼中國史學要例外？！

二十世紀是一個現代化的時代，史學也應當現代化。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有一區別：前者重異而輕同，後者重同而輕異。異，就是多，以別於千篇一律。現代化意味著多元化、多樣化、多面化、個人化，也就是承認異的存在，容忍異的存在，既不以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，也不願自己受制於人。不必效顰，只做自己，做自己的研究，寫自己的文章，不是很有意思嗎？研究歷史人物，我們也不妨試試現代化的原則。

個人的生活是多元的，社會的組成也是多元的。因此，不論是社會發展的研究，或是個別歷史人物的研究，也應當是多元的。胡適和他的種種朋友，思想界的、學術界的、教育界的、文學界的、政治界的、出版界的等等。有的名聞中外，也有的鮮為人知。集中的作者，也是多元的，生活於不同的環境和制度之中，有不同的政治態度、學術思想、和文章風格。自由、容忍、開放，是這本及以後續出的論文集的基本立場。尊重個人、尊重學者、尊重學術、尊重歧見，是本編者採取的態度。學術研究是應當自由表達的、是應當容忍歧見的、是應當沒有定論的。在重視集體、重視政治、重視權威的文化和社會中，有強調這種態度的必要。

一個人的形成和發展，是由於多種的環境和多樣的關係；因此，要研究這個人，應當詳細分析這些環境和關係。各人的環境雖不同，約可分為幾種：文化、歷史、地理、時代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、家庭。各人的關係有種種，大概可分為：親屬、師生、同學、同事、同業、同鄉、朋友、

論敵（政敵）、團體、階層。從種種的關係，可見得一個人在各階段的生活和活動，如讀書生活、寫作生活、教書生活、職業生活、政治生活、家庭生活、感情生活。這種種的關係和生活，都是構成這個人的組成部分，每一部分之間可能有某種的關連性。如要全面的、真實的再現一個人的歷史面目和發展過程，應當研究此人的種種環境和關係。

一個人是社會和歷史中的一個點，無論大小，總還是點。有影響力的人物，能從自身的點與別人的點聯繫起來而成為線，再由線的交織構成面，面的組合可構成體。點、線、面、體間的關係，可以是無形的，如感情和思想；也可以是有形的，如社團和組織。無形可演為有形，有形可化為無形；無形和有形，可以並存，也可以並失。胡適和他的許多交遊，包括朋友和論敵，都是具有影響力的人物，其間的點、線、面、體之中的多樣關係及多種演變，錯綜複雜，都是社會的一部分，都是時代的一部分，都是饒有趣味而且富有意義的歷史題目，從其中不但可發掘多樣的個人的史料，而且可發現多樣的個人與社會、個人與時代的多樣關係。普通的人的生命發展及日常生活，離開不了團體、社會、及時代；歷史人物更是如此。怎樣把個人的歷史，與社會的歷史、及時代的歷史聯繫起來，加以具體的研究和分析，尋找出多樣的關係，是不是會使歷史研究的內涵更加豐富呢？更增加變化呢？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呢？前面提過，胡適的歷史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縮影。在研究他的縮影的過程中，我們同時研究與他相關的許多縮影，是不是一舉多得呢？而且，所得的不是不相連的一些單獨個人的資料，而是相連的人與人之間的多種環節、多種橫切面。如果研究的只是一個人，所重的多是直線的發展，而不容易看到此人周圍的種種環節及此人發展過程的種種橫切面，也可以說，不易見到此人周圍的小環境和大環境。這種見樹不見森林的

缺憾，不妨試用這裏所提的方法來彌補。

胡適先生的經歷、交遊、著述，都是非常豐富。他是一個很豐富的人，很豐富的知識分子。他自己留下的史料，以及別人關於他的記載，也是非常豐富，散存於海內外各地。而且，與他有交往的人，有些仍健在，有些的後人仍保藏著史料或記憶。像胡適先生這樣的一個人，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，面很廣，層很深，環節很多；關於他的看法很多，爭論也很多；因此不易研究，更不容易研究的面面俱到、層層均詳、事事皆周。他周圍的許許多多人，各人有各人的層面，各人有各人的才學和性格；他與這許多人的交往經過、知識和感情上的交流、學術及思想上的異同等等，都很值得詳細研究，而又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。與他有關係的種種社團，各有各的宗旨，各有各的成員，各有各的演變；他與它們的合與分，為什麼？怎麼樣？也都值得深入研究、仔細分析，而又非一二學者專家所能殫精竭慮、巨細靡遺，或在每一項的分析上都做到絕對的客觀。

學術研究的艱辛和困難，我們瞭解；學術研究的自由和獨立，我們尊重；歷史之前人人平等，我們深信。不是空言自由、平等、獨立，而是具體的實踐，在歷史研究中實踐。怎樣從胡適的交遊的角度來看他、來看他（她）們共同的世界，是本計畫的一部分，所以博採諸家的專長、廣納多種的看法。所邀請的作者，很多並不專研胡適，而是對他的某一兩位交遊有獨到的研究。這樣，胡適有他的發言權、有他的辯護人；與他相交者也各有發言權，各有辯護人。多人對話、交流、溝通，總比一人獨白要民主一些、要開放一些、要公平一些、要現代化一些。

現代化意味著個人化，每個人做他（她）自己，有自己精神和生活的空間。這本論文集及以後續出的集子，希望能提供一點空間，讓歷史人物及史學工作者開講演會、談話會，各展其才、

各顯身手。用台灣時髦的話說，讓大家作秀，是卡拉OK式的各抒情懷，你唱我唱他（她）也唱。誰的秀作的好，誰的歌唱的棒，請各人自己打分數。莊子如在場，他會說：不用打分數，分數沒法打。《莊子》，我還沒讀透，所以仍然喜歡咬文嚼字，把這種聚會稱之為歷史的多元化，又因常常離不開英文，免不了自譯一下：pluralization of history。

這裏所說的多元，不僅是人數，同時意味著每個人有其個性，有其特性。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呢？

中國的史學，反映了中國的哲學、文化和社會，一向強調人在聚集體中的社會和政治任務，而不以個人有其內在的、自己的價值。人的社會任務和政治地位，常是史傳類聚的尺度，男性如：帝、王、將、相、臣、吏，女性如：后、妃、母、妻。其中再加上一些道德觀的區分，如忠臣、孝子、賢淑、貞潔等等。各種史傳，不論是中央或地方編的，幾全是人以類聚；傳主有類性，而沒有個性。給人的印象是：都差不多，倒是挺有效的催眠劑。

二十世紀的中國傳記，有很顯著和多方面的進步，內容豐富多了，敘述詳細多了，並且還有種種的分析。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為數不少。但是，二十世紀也有它的問題。本世紀崇尚革命，革命史是史學的重點，革命人物成為敬禮的對象。人物一旦進入革命史，就帶有革命性，所作所為所思所幾無不表現其革命性。革命性有數類，各類之中有共同之點。帶有某一類的革命性，歷史人物的類性非常醒目，好似穿了一套制服，掛著烈士或英雄的徽章，四周有重重的光圈，看上去也頗相似。當然，還有反革命、還有黨派、還有流派、還有宗派、還有主義、還有階級等等。每一項之間可以組合，每一項之下又有類別。名目繁多，令人眼花。還有「成分」說、「出身」論

等等。不管被派定屬於那一類型，就必須在歷史中表現其特定的類性或「成分」，好似穿著特定的制服、戴著特定的帽子、掛著特定的標誌、做特定的事、說特定的話。除了名字和頭銜不同之外，其他也差不多，難以分辨。這些新式的制服和帽子，雖與傳統的衣冠有異，所起的作用略同，都把每個人的個性和特色掩蓋了，抹殺了。又因為新式的名堂比老式的要龐雜，變化也快速，令人應接且不暇，還有什麼時間去分辨呢？又有什麼空間去表現自我呢？

生時聽人擺佈，不能發揮生命的本能；死後任人化裝，依然不能自主剩餘的價值。我讀史時常有這種感想，其沉其重，難以形容，而且，這樣的寫法，是追求歷史的真實呢？還是製造或粉飾虛假呢？人既是歷史中的主體，而歷史中的人，並不是真實的人，那麼，歷史的功用又是什麼？史學的價值和尊嚴又在何處？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，一個嚴重的問題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是我一個人覺得迷惑呢？還是別人也有同感呢？

暫不談史，且看生活中的人。每一個人有沒有個性呢？願不願意表現個性呢？個性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？如果說史學是人學，為什麼人性不可以史學中表現？生活就是歷史，歷史就是生活。從生活中觀察種種的人、觀察個人、比較個人，各人的個性和特徵不就更明顯嗎？即使是兩個雙胞胎，也各有個性，各有特徵，何況不是雙胞胎呢！為什麼不從生活中學習一點歷史呢？

透過比較，歷史人物的個性和特性會顯現出來，而且同處也可瞭然。胡適和他的許多朋友，都提倡應有個人和個性。做到了嗎？讓我們看看，並且比較。這法子，我稱之為歷史的個人化，用英文自譯，individualization of history，以別於歷史的類型化、抽象化、概念化、制服化、帽子化、政治化。

儘管現有的史料不一定都能反映個性，儘管個性的意識有待提高，我們不能不尋找歷史中的個人與個性。正因有此嚴重的缺失，探索更必要，所得也更為可貴。我們的目標是遠的，雖然力量是很有限的。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，我們以此自勉自勵，更須要海內外的學者專家不斷的惠予支持和指教。

還有一點。這種方式的個人研究，會引導我們發現很多新史料。胡適的很多交遊，都有豐富的日記、書信、或檔案。這些寶藏，目前還無法確知；可確知的是，必定愈找愈多。這本論文集只是一個引子，從它，讀者已可略見一些未刊的日記、書信、手稿、檔案及口述史料。從新史料，我們又發現新問題、新題目、新角度，而後再研究、再解釋、再綜合。這個過程，應當是很有意思的。

綜合上言，我覺得，在歷史人物的研究上，尋找新路的時候已經來到。提出的三個方向，可以三個英文字來表示，即：*pluralization*, *diversification*, *individualization*，中文的同義詞就是：多元化、多樣化、個人化。

以上說了一點讀史的思想，卻無意否定其他的看法和方法，只是提出一些可能性，以供同行參考，並望指教。前面已說過，傳和年譜，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，將繼續是人物研究的重要體例。其他方法，如專論、專題，各有其長，各有其用。怎樣配合史料和方法，那是各人的選擇。容人自由選擇，是現代化的一個特點。

三、為什麼要請胡適的朋友做貴賓？

喜歡朋友，是胡適先生的個性。朋友二字，常在他的口頭；致朋友的信，常在他的筆頭；念朋友的情，常在他的心頭。他的朋友，是多樣的，從美國的總統到台北賣麻餅的小販；交遊之廣，可以在中外古今的友誼史上記一筆，很出色的一筆。與朋友的交誼，是他個人生活，也是他公共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的歷史，與他的很多朋友不可分隔；有的給他鼓勵和幫助，有的給他安慰和喜悅，也有的給他悲哀和痛苦。他的許多朋友的歷史，也與他不能分離；付出的種種，他毫不吝惜，並說：利息在人間。他得到的利息，確實在人間，長在人間，處處可見。

研究這樣的一個人，怎能不探討他的交誼？這樣一個人的生日會，尤其是難得的百歲慶，怎能不請他的朋友做貴賓？大家平起平坐，是現代化的一個特色，而且是胡適先生的風格；此會賓主的座位沒有特別的意義，無上下之分。他的貴賓，各有個性和特長，很難以一語概括，姑且這樣簡介，有：為他開闢新世界的梁啟超，他的總角之交胡董人、他的畢生知友趙元任、他倡行白話文學的最早支持者陳衡哲、他新文化事業中的同伴錢玄同、他早期著作的出版人汪孟鄒、他的老師兼益友王雲五、他的新詩詩友徐志摩、他敬佩的史家陳寅恪、及與他共事科學教育的任鴻雋。

學術研究，不須求同，而貴在多樣化，並容許多樣化。歷史本身就是多樣化的母親。歷史人物的繁富性，為史學工作者提供多樣解釋、敘論、和評價的可能性；史者的文章和論議也可能影響古人的千秋聲名和地位。古人和史者的關係，本來是多樣的，因人而異，因地而異，因時而異；

能如此，史著中才有個人和時代的生命。史者與讀者的關係，也是多樣的，因人而異，因地而異，因時而異。史者可能影響讀者，讀者的回響也可能影響史者。歷史的耳朵，能聽上下古今，四方八面；而且各種音響，透破時空的界線，可能交相作用，奇妙難測，生生不息。這些變化無窮的音響，有名稱嗎？我不知道。姑且名之為多樣曲吧！

一九九〇年十月於紐約

（本文原係作者編「胡適與他的朋友」論文集序文）